

国外学者 彝学研究文集



巴莫阿依
黄建明◎编



国外学者 彝学

K281.7-53/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外学者彝学研究文集/巴莫阿依、黄建明编.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0. 7

I. 国… II. ①巴…②黄… III. 彝族—民族文化—研究—
中国—文集 IV. K281. 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37806 号

责任编辑: 普家华

封面设计: 高 伟

书 名: 国外学者彝学研究文集

编 者: 巴莫阿依 黄建明

出版发行: 云南教育出版社 (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

印 刷: 云南农垦印刷包装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10.25

字 数: 250 000

版 次: 2000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1000

书 号: ISBN 7 - 5415 - 1789 - 5/G · 1470

定 价: 15.00 元

《国外学者彝学研究文集》序一

(美) 郝 瑞

许多中国学者听说出版《国外学者彝学研究文集》一书，可能会大吃一惊。因为就连中国学者（除了为数不多的专家外）对彝族社会、历史、文化的认识也并不多，何况外国学者？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都不怎么欢迎外国学者来华做任何方面的研究，特别是少数民族研究。其原因是少数民族地区比较贫穷、比较偏僻、交通不便，而接待外宾的规定又很严格。加之，外国学者也没有机会学习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从中国国内的情况来看，“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术研究一直处于冷冻状态，与许多学科一样，民族学、民族史学术研究几乎停息。可以说在 1980 年以前，任何外国学者和学生想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包括彝族，都很难实现。

20 世纪 80 年代初，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到 80 年代后期，少数民族地区也逐步对外开放。中国民族学界、民族史学界，甚至包括各级民族地区的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研究所也都开始欢迎外国学者参加合作研究项目。起初，外国学者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做田野调查限制仍较严格。比如，1988

年我赴四川攀枝花市盐边县调查时，批准我的调查时间只限一周，调查地点规定在路边（因为没有写清是公路还是山路，我的调查实际上走得远了些）。那些贫穷、偏僻的民族乡还是基本不准进入的。不过，尽管限制较严，规定很多，不少欧、美、日学者还是到中国民族地区尤其是西南、西北的民族地区做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出版了许多描写和分析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历史与文化的论著。

20世纪90年代以来，少数民族地区对外开放的步子迈得更大，中外学者的学术合作关系也更加密切。由于人们到民族地区变得日益方便、容易，许多外国学者能够有机会多次深入民族地区做田野调查，加之又有条件学习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字，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自然得到极大提高。记得1994年，当我要深入到四川盐源县不通公路的地方去调查时，县委书记就只嘱咐了一句“你要注意身体啊！”并没有作任何调查时间或地点上的限制。不少比我年轻、身体强壮、胆子更大的学者和研究生更能够深入少数民族地区，作更长时间的调查，从而对调查的对象作了更详细的描述和更深入的分析。总之，如果说80年代外国学者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还只是条条涓涓的溪流，那么90年代后，这条条溪流渐渐汇成了滔滔的大河：在各国的学术刊物上能够见到有关中国少数民族的论文；各地的出版社出版着有关中国少数民族的专著；各种国际学术会议上宣读着有关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论文。当然，其中有许多是关于彝族的论文和著作。

尽管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的春天出现在学术僵冻的冬季之后，但其春的信息却是孕育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的百年之间。从19世纪中叶开始，欧美各国的科学家、探险家、

传教士到中国少数民族地区考察、探险、传教。有的传教士索性长期定居在了中国西南民族地区。他们调查搜集各民族的社会、历史、文化、文学等方面的材料，用英文、法文、德文发表和出版了许多有关少数民族的论文和著作。虽然在这些论著中所使用的学术语汇、采取的科学分析模式、反映出的思想观点与今天的相去甚远，并且我们阅读这些论著还需要做一种文化的翻译，但是，这些论著对我们今天的民族学、民族史学研究，价值不可低估。因为这些作者开启了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的先河，他们是用科学的观点来分析研究中国各民族社会生活的第一代学术先贤。我们继续着他们的工作，在他们所打下的彝学大厦基础上建造着又一层更新颖、更精美的楼层。

不过，我们这些外国的彝学学者所能够修筑的只是这栋楼层的一个角，其主体工程 and 许多具体工作需要彝族自己的学者和中国各民族的学者来承担。尤其是彝族本民族的学者，从小就会自己的语言，自幼就习自己的文化，自己参与自己的社会活动，调查的机会多，蹲点的时间长。彝学的成长壮大，主要依靠彝族本民族的学者，依靠他们的知识、他们的热情、他们的汗水。可以说，没有彝族本民族学者的贡献，将不会有彝学这个学科的繁荣与发展。

光阴荏苒，时过境迁。与清末民初时期相比，今天彝学研究者的结构已发生了较大变化，我们这些外国学者不再是惟一能够运用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彝族历史文化的“英雄”了。在这种情形下，外国学者对彝学的发展还能不能够作出令人认可的贡献？还能够作出什么样的贡献？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请各位读者阅读本文集所收入的论文，也请各位读者自己判定这些论文的价值。不过，我愿就此陈述几点自己的看法，仅供读者

参考。第一，在中国学术界与国际学术共同体接轨中，外国学者可以充当桥梁，把彝族和彝学这一端的情况介绍给外国和国际学术界，同时把国外人类学、历史学等另一端的新理论、新方法传送给彝族学者和中国各民族学者。第二，外国学者能够利用各自的语言资源和学术环境在英语、法语、日语、德语等学术刊物上用最新的理论和观念来讨论彝学问题，这无疑会给彝学研究带来新的气象，注入新鲜的血液。第三，外国学者看彝族社会，是一种“远观”。中国有句成语“旁观者清”。“远观”自有“远观”的长处，可以弥补“近观”或者“自观”的不足与缺陷。我们外国学者希望我们的“远观”会对本民族学者和其他各民族学者进一步认识彝族历史、了解彝族文化有所裨益和有所帮助。

最后，我认为所有从事彝学研究的外国学者都与我一样有着深切的感受：在这 20 年来的调查研究活动中，我们所认识的彝族同仁们，所结交的各界彝族朋友们，给我们提供了慷慨的招待和长期的帮助，彼此结下了真诚的友谊。这不但使我们的调查研究获得了成功，而且帮助我们提高了研究成果的质量，同时也在我们的心灵深处开辟出了一方溢满着彝人友情的空间。就是说，我们这些老外已经在心里把一个地方献给了彝族：这是一辈子也挥不去的彝人情谊，我们一辈子也不会离开彝学研究的课题！因此，这本《国外学者彝学研究文集》仅仅是第一集，我相信今后还会有。

1998 年 12 月 26 日于美国西雅图

《国外学者彝学研究文集》序二

(德) 托马斯·海贝勒

我开始研究彝族是在 1977 年。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家，我一直对民族问题和世界少数民族问题抱有极大的兴趣。当然，作为一个曾在中国工作过的学者，我自然把学术关注点放在中国少数民族问题上。我 1977 年来到中国，曾在《北京周报》做过四年的翻译和审稿人。我的目的是理解中国和中国社会，包括中国的少数民族。抵达北京不久，我就到我工作的北京外文出版社图书馆查阅有关中国少数民族的资料。但是，有关资料少得出奇，只有一两本概况之类的册子。几个星期后，我偶然地发现了一本英文著作，书名是《凉山奴隶》，作者是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在中国工作过的一位名叫艾伦·威宁顿的英国专家。这本书是 1959 年在伦敦出版的。书中详细地描述了彝族的历史、社会与经济，分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诺苏地区发生的变化。几周后，我又找到了一本关于彝族的重要著作《凉山彝家》，其作者是著名的中国人类学家林耀华，该书 1947 年在上海出版。这本著作极大地激发了我对凉山诺苏的兴趣。于是，我与中央民族学院取得联系，采访了当时在该校进修的两位 78 届干部学员。一位是来自凉山越西县的妇联干

部，名叫海来阿芝；另一位是西昌消防队的干部，名叫吉克几库古布惹。这次采访的结果发表在德中友好协会的《新中国》杂志上。当时，我是德中友协联邦理事会会员，1984年我被选任德中友协的主席。

1981年7月，在返回德国前，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邀请我和我夫人王静到凉山彝族自治州做调查。当时四川发生洪灾，我们的行程因此推迟到8月。我们在西昌、昭觉、美姑、越西和喜德进行了为期几周的考察。陪同我们考察的是两位本地彝族，一位做翻译，名叫阿洛乌达；一位是资深的语言专家，名叫马黑木呷。当时，我们研究的出发点是想搞清楚民族区域自治是怎样在凉山贯彻执行的以及在这一地区为了发展实行怎样的发展方针。回到德国后，我们把那次考察的收获写入了1984年在德国出版的一本重要的著作，题目为《中国民族区域中的民族政策与发展方针》。随后，我出版了47部（篇）有关中国少数民族的著作（论文），其中涉及彝族的仅仅是一部分。我在凉山收集的传统服装、漆器和餐具等实物在20世纪的80年代和90年代分别在德国进行巡回展出。

1981年后，我又有三次机会回到西昌以及其他省地的六个县市做有关个体经济方面的调查，其部分考察结果于1986年在北京呈交给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最后一次赴凉山的调查是1999年开始的一个新项目，对象是凉山彝族企业家。这个项目是凉山民族研究所与德国杜伊斯堡大学之间的合作项目，我任该项目的主任。该项目得到德国大众汽车基金资助，为期3年，即2000~2002年。

虽然其间有好几年我没有回凉山，但我一直与凉山保持着联系。20世纪80年代末期，州委副书记毕玉华先生和州人大

主任罗国清先生先后率领凉山彝族自治州政府代表团赴德考察。作为东道主，我在自己家里款待他们。当我到德国西北部去做有关彝族问题的讲演时，我结识了当时正在德国接受农业科学培训的杨明，我为他在波恩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安排了奖学金。

每次我访问成都，我都要与成都的彝族老朋友们聚会。而那时，出差到成都是很经常的事情。比如，1988年当我陪同当时的威斯特伐利亚州的州长——今天的德国总统约翰尼斯·鲁到四川进行官方访问时，我也没有忘记拜访我的彝族朋友。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我没有机会访问凉山，但在中国的甘肃、宁夏、四川、贵州、黑龙江、河北、浙江、江苏和河南进行有关乡村课题和民营企业家的田野考察。1995年，由斯蒂芬·郝瑞教授发起并组织的第一次国际彝学研讨会在美国西雅图召开。在那次研讨会上，我遇见了许多彝族老朋友。那次會議可以说是彝族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也是我学术生涯的一个转机。提交会议的论文质量较高，表明了彝族年轻学者们具有良好的学术素养。斯蒂芬·郝瑞把那次会议的论文汇编成集，2000年秋季将由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实际上，我从研讨会上新的研究成果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对彝族历史与社会各方面的理解更加深入。会议上学者们坦诚、直率但不失友好的态度感染着我，我决定在德国组织召开第二届国际彝学研讨会。1998年，第二届国际彝学研讨会如期在德国最古老的城市、马克思的故乡特里尔召开，有15位中国彝族学者和15位外国学者出席了会议。与第一次研讨会一样，这次会议洋溢着自由与友好的学术交流精神。正因为如此，我决定与凉山的彝族学者合作，继续我对凉山的研究。

1999年在凉山进行的田野考察表明，合作研究对于来自不同文化和社会的学者来说，是一个相互学习和结合大家智慧的好机会。

根据我从事学术研究30多年来的体会，要理解一个文化、一个社会，必须具有多学科的知识与多文化的视角。仅仅靠一个或两个学科要完整地理解一个社会是不够的。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的合作研究，只有利用其不同的理论、不同的方法与不同的背景，才能获得对事物的深入认识与全面理解。因此，科学研究需要来自历史学、人类学、经济学、文学、语言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各学科的学者们联袂合作、协同攻关。有时，学者们的研究和意见不尽一致，尤其是来自不同文化和社会的学者之间更是如此。但学者们有义务进行批评性的考察，并有责任依据事实说话。学者绝不是政治家，亦不是商人，学者的任务是试图鉴别问题与找到解决问题之途径。正如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曾告知我们的那样：科学必须具有批评的特质和提出问题的功能，否则就不成其为科学。对此，全世界的学者们都应该牢记在心。

目 录

《国外学者彝学研究文集》序一	(美) 郝 瑞 (1)
《国外学者彝学研究文集》序二	(德) 托马斯·海贝勒 (5)
从族群到民族	(美) 郝 瑞 (1)
——中国彝族的认同	
Ethnic Group 与民族	(3)
主位与客位：聚拢与切分	(5)
民族识别及其结果	(8)
民族领域的开放与改革	(12)
凉山彝族族别的普及化	(15)
讨 论	(26)
山谷房屋：忆彝族头人	(美) 艾瑞克·马格拉 (32)
能承受车些负担的那些人	(36)
富有生殖力的祖先	(40)
看守人、说话人、背夫	(45)
养马钱	(49)
说话人的钱	(51)
草 钱	(52)
结 论	(55)
撒尼人的民族认同性：1990~2000	(美) 司佩姬 (60)
引 言	(60)

走访师妈	(61)
观察师妈	(65)
结 语	(67)
凉山彝族的宗教蜕变	(法) 魏明德 (71)
——今日凉山彝族宗教信仰与体验调查探析	
引 言	(71)
凉山彝族的社会与宗教	(72)
彝族宗教传统与现况：美姑县 1997 调查研究	(85)
结 论	(103)
彝族的家支制度与祖先崇拜	(日) 樱井龙彦 (106)
导 言	(106)
家支制度的概述	(108)
家支制度的职能	(112)
家支制度与祖先崇拜的关联	(115)
结 论	(120)
有关凉山地区彝族诺苏支系宗教的六项论题	
.....	(法) 魏明德 (127)
民主改革前小凉山诺苏对奴隶制的历史意识	
.....	(美) 马克安 (136)
奴隶与同化	(138)
奴隶、家谱和家支	(140)
财富与奴隶	(143)
结 论	(145)
凉山彝族的社会教育变迁	(美) 马丁·斯科恩阿斯 (147)
教育的作用	(148)
学校教育对彝族传统文化的影响	(151)

彝族包办婚姻制	(153)
教师、学校及其对彝族学生价值观的影响	(156)
彝族语言政策	(澳) 布莱德利 (160)
族 称	(160)
地理位置及人口	(161)
操彝语的人数	(163)
语言政策	(164)
结 语	(166)
一致性与多样性	(波) 瓦斯露丝卡 (168)
——彝族文字的体系及其多种表现形式	
彝语支民族语言调查报告	(澳) 布莱德利 (181)
表意文字还是表音文字	(波) 瓦斯露丝卡 (193)
——对古彝文字的类型识别	
关于彝文	(195)
彝文表音文字说	(197)
彝文表意文字说	(199)
两种分类法中存在的重要问题	(201)
彝语表现形式	(205)
结 论	(206)
中国彝族经典《指路经》的社会教育功能	
.....	(日) 樊秀丽 藤川信夫 (209)
问题设定	(209)
研究方法	(210)
三大仪礼的特征	(212)
《指路经》的社会教育功能	(216)
结 语	(235)

混沌中的诞生·····	(日) 樱井龙彦 (238)
——以《西南彝志》为例看彝族的创世神话	
前 言·····	(238)
宇宙起源神话·····	(240)
人类起源神话·····	(248)
洪水神话、始祖神话·····	(249)
结 语·····	(259)
关于云南彝族的洪水神话·····	(日) 西胁隆夫 (263)
洪水神话的类型和结构·····	(264)
云南彝族的洪水神话·····	(267)
洪水神话的一些问题·····	(269)
彝族漆器：一项传统工艺及其晚近变迁	
·····	(美) 郝 瑞 (272)
变迁之一：工厂产品·····	(277)
变迁之二：商品零售·····	(282)
变迁之三：民族叙事·····	(285)
漆器民族化·····	(292)
舞台化的场景：中国云南石林风景后现代的真实性何在	
·····	(美) 司佩姬 (298)
前言：返璞归真与假造复制·····	(298)
舞台化的真实场景和景观·····	(300)
场景：原初的石林·····	(302)
风景：阿诗玛商品化·····	(302)
场景：建造出来的石林·····	(307)
景观：与民族认同分离的风景区·····	(309)
结 论·····	(311)

从族群到民族

——中国彝族的认同

(美) 郝 瑞

在四川攀枝花市米易县的横山和麻隆两镇，居住着这样一群人：在当地的汉语方言中他们称自己为亚拉，在自己的语言里则自称为尼洛。这个群体大约只有 600 人左右，他们的语言极富生命力。

在横山，亚拉人居住在小镇对面的两个村子里；在麻隆，亚拉人居住在镇集市上方的一个小聚落中。麻隆镇虽然拥有一条人工铺出的长 100 米的小街，但小得真够不上称之为“镇”。在确定民族成分时，这里的亚拉人被划定为彝族。对于自己的民族归属问题，大部分亚拉人都保留着异议。但是，他们所做的是在当地的文献中写上自己是彝族的支系或旁支（彭等，1992：49～53），以表明自己与彝族不是一回事。当地见识广博的人们认为，最早在此居住的是亚拉人，继而是汉人，最后迁到此地的才是诺苏，即凉山彝族。虽然无法确知第一批汉人迁移到此的时间，但毫无疑问，诺苏是最晚来到这里定居的。尽管彝族的人数很多，在麻隆，甚至占到了多数。就像当地自称为纳苏（或阿布）和塔直的小群体那样，亚拉人也认为

他们是在明朝洪武年间来此居住的。

亚拉人或许原先实行过群体内婚制度，其表现即为双边交表婚。虽然人们已不再严格地奉行这种婚姻制度，但我至少记录下一个交换婚个案。与交表婚相伴随的是，大量的婚姻都在两个氏族之间缔结。这一现象在麻隆尤为突出，因为当地只有两个氏族。有人对我说，民主改革前，他们不与汉族通婚，只与傈僳族开亲。后来，傈僳族离开此地迁到别的地方去了。如今，亚拉人与汉族通婚已很普遍。据我所做的家户调查，两代人的 39 桩婚姻中，有 16 桩是亚拉人自己内部的婚姻，有 21 桩是与汉族人的婚姻，此外还有两桩是与阿布人的婚姻。我还发现几对横山亚拉人与麻隆亚拉人之间的婚姻事例。近年来，在小小的亚拉社区中内婚的比例几乎占新缔结婚姻的半数。这一事实说明，亚拉人在婚姻对象的选择方面，族群性（ethnicity）仍然是一个要考虑的因素。或许，亚拉人会继续与他们原有的姻亲通婚，而过去凡与亚拉通婚的人往往变成了亚拉。亚拉不与之通婚的就是诺苏。尽管如此，亚拉和诺苏都被划归彝族。

如今，亚拉人的语言依然顽强地保留着。在麻隆，成年人在家里似乎大部分时间都说亚拉话。当然，他们也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不过，我认为，在横山亚拉话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基础，那里亚拉语只局限在成年人中使用。据有的亚拉人说，他们曾经有过自己的书面文字。一位在横山行医的颇有学识的男子就对我说，亚拉的文字是在清朝年间才失传的，并认为这是很大的耻辱。因为找不到自己的文字，他们就得保持彝族的民族成分，尽管他们与彝族毫无干系。